

毛泽东任用干部的艺术

□ 吴继金



毛泽东毕生重于揽才，明于识才，长于育才，善于用才，可以说，他的用人谋略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慧眼识才

毛泽东是一位高明的伯乐，他善于发现和识别人才，并加以任用。经毛泽东亲自考察、选拔的人才，从士兵到将军，从布衣寒士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可以说有成百上千。毛泽东为千千万万人才创造了施才华、展抱负的广阔天地，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位“伯乐”都无法与之比肩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际，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刚从学校出来的罗荣桓也在队伍中。罗荣桓是个老实人，他是在武昌中山大学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他是大学生，所以兼任管账先生，但在率领农民自卫军参加秋收起义的转战途中，竟被两个痞子兵把钱箱都骗走了。然而，就在这时，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位革命意志坚定的“书生”，任命他为特务连党代表。在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发现了罗荣桓许多可贵的素质：凡是要求战士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打仗时冲锋在前，退却时掩护在后；行军时为病号扛枪，宿营时下班查铺，吃饭时带党员去站岗放哨——尽管这意味着有时要饿肚子。罗荣桓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成为战士的知心朋友，深受士兵的爱戴。此后不到三年，毛泽东即任命罗荣桓为红四军代理政委。

毛泽东曾评价罗荣桓说：“荣桓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罗荣桓果然不负众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

了不朽功勋，成为赫赫有名的一代元戎。这可以说是毛泽东识英雄于草莽之际的典型一例。

任人唯贤

毛泽东曾说过，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时，毛泽东家乡的亲戚和朋友纷纷给他写信，或要求给个人安排工作，或要求给所在地特殊照顾，毛泽东都一一婉拒。他对秘书田家英说：“凡是要求到北京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我给安排什么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

任人唯贤，必须有恢宏的气度和广阔的胸怀；海纳百川，才能聚天下之英才。毛泽东曾经说，我们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宗派。从抗日战争

初期他就强调，对于各地区、各民族、各党派以及各种出身的干部，要一视同仁。这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搞任人唯贤的“五湖四海”，就是要善于吸纳、团结和使用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人才和干部，联合具有不同社会地位和观点的各界人士，就是要坚决地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毛泽东有容纳五湖四海的胸怀，践行五湖四海的揽才之道。纵观他的人才阵容，五湖四海，三教九流，莽莽苍苍，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不拘一格

清朝龚自珍有句名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拘一格，意思是指选拔使用人才不局限于一种规格、方式。毛泽东十分喜爱这句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在选人用人方面正是这样做的。

毛泽东对粟裕的任用是他不拘一格、量才用人的典范。早在抗日战争

时期，30多岁的粟裕已显露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他所率领的部队仅在1938—1943年即歼灭日伪军10万人。1944年在车桥战役中，一次歼敌近千人，使苏北敌军闻风丧胆。毛泽东相信，这位从士兵成长起来的将领，有能力指挥四五十万人的军队。抗战结束后，粟裕即担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内战爆发后，粟裕率野战军3万人迎击国民党军5个整编师12万人的进攻，一个半月内，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歼敌5万多人。当粟裕率部到达山东与陈毅会合后，毛泽东于1946年致电陈毅等人，指示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粟裕不负所望，3个月之内，协助陈毅，具体指挥了宿北、鲁南、莱芜战役，均获大捷。当国民党集中60个旅45万余兵力向山东发动重点进攻时，粟裕“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集中全部主力，打击中路突进的敌74师，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迫使向鲁中进犯之敌全线溃退。粟裕在解放战争中能发挥重大作用，成为解放军百战百胜的优秀将领，显示了毛泽东不拘一格、重用后起之秀的成功。

毛泽东在选人用人时反对论资排辈，坚持破格提拔年轻的杰出人才。只要识得英才，毛泽东就大胆地加以运用。毛泽东曾说：“赤壁之征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古代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破格提拔？”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任命十八九岁的“娃娃”当师、团长，任命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当军团长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而几十年的腥风血雨又证明，毛泽东识人识得真，用人用得准，他们都成为所向无敌的战将。

（摘自2018年12月24日《天津日报》）



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人才都是第一资源。重视人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夺取全国政权仅仅用了28年的时间，党自身也从50多人发展到8900多万人，创造如此奇迹，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集聚了同时代一批非常优秀的人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极为艰苦的环境里，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和充分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吸引和聚集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加入到革命队伍，从而保证了我们党成为中国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并在革命中不断发展壮大。蔡和森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从中国革命的需要出发，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人才观”。

蔡和森“人才观”的主要内容

蔡和森生长在一个风云激荡的革命时代，列强侵略的民族危机和军阀统治下的社会黑暗，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激发起的各种新思潮的影响，使蔡和森从青年时代就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并立志要改造中国和世界。这使他更多地从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来思考人才问题。他认为，“作为中国青年应以洗血国耻为任，以国家富强为奋斗目标”，“要知道国家和世界大事，注意政治”，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920年7月，在蔡和森的主导下，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的蒙达尼召开会议，将新民学会的方针正式确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同年8月，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到，“现搜集各种小册子约百种”，正在研究：“（一）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三）世界革命之联络与方法，（四）俄国革命后之详情”。并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此外。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并认为这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蔡和森正是以世界革命的眼光来思考改造中国的问题的。

蔡和森对于人才的道德修养有着独特的见解，他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改造的需要出发，提出要有“只计大体之功利，不急小己之利害”之德。他认为，“世之君子，为种种的舆论、道德律所束缚，只能为伪善，是以使小人得积极横行”。所以，君子应以大局为重，不能过分看重自身名节，要愿与小人伍，改变小人掌控局面的现状。同时，蔡和森认为，“身体是在世界上做事立业之根本”，因此，人才不仅要要有健全的人格，还必须要培养强健的体格，坚持进行体育锻炼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可以磨练意志。他在北京做教师之时，“经常在课余时间教学生踢足球或练武术等，设法开展各项活动”，以此增强学生的体质，强健学生的体格，磨练学生的意志。

蔡和森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他认为人才是需要培养的，凡为人才，必定要具有丰富的学识和专门的知识或技能，是“有适当之储蓄”的人。蔡和森十分喜欢去图书馆看书，获得了许多方面的知识，“这对他后来的革命工作是很有用的”。但是蔡和森认识到，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下，要达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的，人才所急需的不只是“有适当之储蓄”，还要“有适当之练习”。中国的前辈名人，“疏空罕成者”，“此非其才之不足，智之不逮也，无充分之练习故耳”。他总结长期的革命实践的经验，指出中国革命不仅需要理论人才，更需要“在不停的争斗中去锻炼出大批干部人才”，这样“才能真正使党部成为由本地斗争锻炼出来的健全党部，而不是过去仅仅有高级机关委派之党部”。

1918年，蔡和森在给陈绍休等人的信中谈及组织留法预备班人数之

蔡和森的『人才观』

□ 孙雯 宋俭



时，为了培养大量人才，他指出“对留法预备班人数不可以人数有限遏其动机”，可以想办法能省则省，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到外面学习。蔡和森认为各级党组织可以通过举办短期培训班培养大批干部人才，“训练班的主要目的在于‘使他们知道做支部的经常工作及怎样组织部分的日常斗争’”。这有利于推动组织工作进行顺利，也能缓解基层党组织干部人才严重缺乏的现状。

蔡和森“人才观”的鲜明特点

提倡培养德智体兼备的人才。蔡和森认为中国革命任务艰巨，对人才在德、智、体三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他提倡人才应具有大德，他所认同的大德来源于墨子“兼爱”、“非攻”思想，强调真正的正人君子能够为了众人的利益不计较个人名利之得失，不能称之为人才。蔡和森提倡的智就是指人才要同时进行“适当之储蓄”和“适当之练习”，只有两者都具备的人，才是最好的。当时世界上有个流行的说法，中国是“东亚病夫”，蔡和森自身也深受哮喘疾病的困扰，这使他认识到要革命就必须有个好身体，加强身心锻炼势在必行。他制定了固定的作息时间和运动时间，不管刮风下雨都坚持锻炼，他认为这样不仅锻炼了体格还有益于锻炼意志。张昆弟就曾在日记中评价：“大丈夫独患无身耳，体强心强，何事不可为？”

要利用集体的力量培养大批人才。当时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的黑暗时期，只有极少数有识之士积极致力于改造中国，中国急需培养大量的人才投身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事业之中。蔡和森提出应该依靠集体的力量来培养大批人才，新民学会就是这样一个集体，汇集了当时各类人才，并制定各项纪律规定。会员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问题，改变当时中国社会日益“晦盲闭塞”的现状，从而培养出了大批人才。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蔡和森认识到组成革命联合战线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革命仅仅靠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还要“抓住利用其他势力”，组成联合战线，“凡属一切不压制群众意见，不妨碍党的改造的分子，都尽可能地安排到工作岗位上来”。

（摘自2015年第3期《湘潮》（下半年），原标题为《蔡和森人才思想初探析》）

党的宗旨的党章第一部确定

□ 朱文通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这是中国



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他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从此，为人民服务不再仅仅是一个政治口号，而是作为党的宗旨被写入了党的七大的党章。此后，党的历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党的宗旨都有重要的论述和阐发。

（摘自2014年6月4日《光明日报》，原标题为《朱德与“誓为人民服务”口号》）

党章中“任人唯贤”规定的由来

□ 王毅

任人唯贤是中国共产党选拔、培养、使用和管理干部的根本途径和基本准则，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和执行的组织纪律。党章规定：党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选拔干部，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该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

此时，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路线是有现实指向性的。全面抗战已经进行了一年半左右，当年10月，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国民党的抗战方针和能力在日本全面侵华的战略下捉襟见肘，抗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把主要战场转入敌后，共产党之于抗战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也因此彰显。“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选贤与能，才能担负起领导抗战的历史使命。

建立一支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以担负抗战的领导责任，是当时毛泽东提出任人唯贤“立”的意蕴。除此，任人唯贤还有“破”的深意，即破除中国共产党

历史上选任干部错误路线的影响。当时毛泽东讲了这样一段话：“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

土地革命时期，因为“左”倾思想的影响，党的组织干部路线出现过偏差，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宗派主义，任人唯亲。结果是有着丰富斗争经验、联系群众、能力素质过硬却疏离于“左”倾路线之外的老干部被“靠边站”，被打击、处罚甚至撤换。大批优秀的同志因此受到错误的处理甚至被诬害，给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鉴于此，毛泽东提出任人唯贤，要用德才兼备的标准识别、选拔、考察、使用干部，反对任人唯亲，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搞“五湖四海”。

自此以后，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被确定下来，并随着历史的发展及党的任务的变化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1977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大，鉴于“文革”的教训，提出要认真执行无产阶级“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正式确立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根据这一规定，2002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2014年修订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都明确规定任人唯贤是选任党政干部的原则之一。

（摘自2016年6月4日《光明日报》，原标题为《“任人唯贤”规定的由来》）

毛泽民：廉洁自律的模范

□ 李晓巧

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在中央苏区是廉洁自律的模范。他从不搞特殊，就连他的兄长、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前来视察时，他也绝对不用公费招待，有时仅是一杯白水而已。

有一次，方志敏的胞弟、中共黎川中心县委书记方志纯，招待省委检查工作的领导吃了一碗米粉肉，到财务报账时，毛泽民坚决不同意，并严肃指出：“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

干部更要带头艰苦奋斗，不应该用公款招待。”他对方志纯说：“志纯同志，这笔钱要从你自己的伙食费中报销！”

在毛泽民的率先垂范和严格要求下，苏区国家银行从未发生过贪污盗窃和行贿受贿案件。可见，当年的苏维埃政府被称为历史上空前廉洁奉公的政府，这是言之不虚的。

（摘自2017年第14期《群众》，原标题为《一首山歌唱出“苏区干部好作风”》）